

渡口有一支难忘的歌

■肖力民

我慕名走进钟桂英的儿子张复信家。说起家里的红色故事,80岁的张复信泪眼婆娑。他的小爷爷、父亲、叔叔等8位亲人参加红军,全部壮烈牺牲。母亲钟桂英既是红军又是苏区干部。长征前夕,为了让更多的青壮年参加红军,钟桂英冒着危险,经常晚上提着马灯去护红。

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反动派反攻清算,大肆迫害和屠杀苏区干部和群众。钟桂英被逮捕后,敌人对她进行严刑逼供,用荆条抽打她,但她始终保守党的秘密。气息奄奄的敌人将血肉模糊的她扔进牛栏里,点了一把火,扬长而去。一名共产党员冒着生命危险,将奄奄一息的她救出,送到曲洋的一座庙里养伤,3年后才回到家里。

因被严刑逼供和大火烧过,钟桂英原本清秀的脸完全变了模样,眼睛不能完全睁开。全身的真皮层全部烧坏,汗无法排出来。一到夏天,全身好像有无数只蚂蚁在咬她。因腋下粘连,胳膊无法全部抬起。从儿时起,张复信每天都要搬个小板凳,坐在母亲身边,为她挠痒。尽管经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折磨,钟桂英却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顽强地生活。1994年,85岁的钟桂英离世。张复信形容母亲“意志比钢铁还坚硬”。

为了让更多的人铭记那段红色历史,张复信先后向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捐献了10多件文物。他成了纪念馆的常客,纪念馆成了他的精神家园。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亲切地称呼他“宝藏爷爷”。

三

“路迢迢,秋风凉。敌重重,军情忙。红军夜渡于都河,跨过五岭抢湘江……”《长征组歌》提及的第一个地名便是于都河。

我来到于都河畔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如帆高耸,庄严肃穆。渡口边一块巨型石头上,由杨成武将军题写的“长征渡口”4个红色大字格外耀眼。清风阵阵,河水缓缓向西流去,20多米长的浮桥横卧河面,仿佛在诉说当年红军星夜渡过于都河的故事。

为什么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把于都作为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县党史专家张小平告诉我,主要有4个原因:一是便于红军主力集结。长征前,红军主力主要分布在兴国、宁都、石城及福建长汀一线,其中大部分(红一、三、五、八军团)分布在靠近于都的兴国、宁都地区。二是便于休整补充。红军主力在长征前一直处于紧张的战斗状态,转移前要进行必要的休整,同时进行人员、武器装备、粮食物资的补充。于都是中央根据地第五

次反“围剿”后期的大后方,西面有粤三山山脉作为天然屏障,相对安全稳定。三是便于突围。红军当时转移的最初目标是同湘西红二、六军团会合,路线是先向南到粤赣边境,再往西进湘南,然后往北到湘西。于都紧靠中央苏区与粤军的防线,选择在于都集结,便于顺利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四是便于保密和隐蔽。红军主力在出发前集结于都河北岸,有利于隐蔽,不易被敌军发现。

正在长征渡口寻根问祖的王太和说:“我父亲王耀南当时任红军工兵营营长。1934年10月上旬,他正组织工兵在宁都县构筑工事,准备与国民党军队决一死战。接到去于都河架设浮桥的命令后,于10月12日上午到达河边。当时,于都河面宽600多米,父亲用一片树叶测试了河水的流速,最大流速每秒1.2米。河上没有桥,大部要过河,只有架设浮桥。”

沿河百姓捐献了800多条渔船,有的用于架设浮桥,有的用于摆渡。因当时搭浮桥需要大量的木板,很多老表把自家的门板、床板主动拆了抬来,有的把瓜棚都拆了。王太和告诉我:“当时一位姓曾的大爷,执意要把自己的寿材捐献出来。父亲不忍心收,曾大爷火了:‘这位同志啊,怎么硬是不通情理,红军打仗命都不要了,我拿出几块棺材板算什么?’父亲拗不过曾大爷,只好收下。”

为了避免敌机轰炸,隐蔽红军的战略意图,架设浮桥都是在17点以后进行。红军晚上渡河后,第二天6点前再把浮桥拆除,依次两岸排开,17点以后重新架设。据统计,在于都县60华里的河段上,共架设浮桥5座,先后架桥、拆桥15次。

自1934年10月17日晚至10月20日凌晨,8.6万名中央红军有的走浮桥,有的坐船,有的涉水过河,从东门、南门、西门、山峰坝等8个主要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长征路。1934年10月18日傍晚,毛泽东带着警卫班离开何屋,和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中央、军委机关,从东门渡口迈出长征的第一步。周恩来踏上浮桥出发时,曾经深情地说:“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

四

在风光旖旎的罗坳镇鲤鱼渡口,我遇到老船工李声仁的儿子李明荣。说起父亲用渔船送红军渡河的故事,李明荣感慨万千。

1934年10月17日上午,李声仁和爱人王九发等家人正在于都河鲤鱼潭河段撒网捕鱼,几名红军官兵招呼他们把船撑到岸边,对他们说:“我们有大部队要在晚上渡河,想请你们帮忙。”李声仁听说是红军队伍要渡河去打“白狗子”,二话没说,满口答应:“你们要几条

船?”“越多越好。”“那我们叫上整个家族的渔船一起来,总共有20条。”红军官兵高兴得连声说:“谢谢渔民兄弟!”

李声仁随后召集家族代表开会。一位远房叔叔首先表态:“自从红军来了以后,咱们渔民都不用交税了。咱应该记住红军的恩情。红军有难处,咱们理应帮助。”“送红军过河,我没有意见。但是我们的祖训是‘晚上禁止开船’,现在要打破这一祖训,谁来保证安全?出了事谁负责?”一位堂哥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李声仁最后说:“安全问题我跟红军协调解决。一定会保证我们自身和红军的安全,大家尽管放心。天黑前到鲤鱼渡口集中!”

天黑前,李声仁和家人把20条渔船撑到鲤鱼潭河段岸边。待天色渐暗,红军官兵依次登上渔船。大渔船坐5个人,小渔船坐3个人,每条渔船均安排一名水性好的战士任安全员。李声仁和爱人王九发同撑一条大渔船。当时河水湍急,晚上撑船必须全神贯注,稍不注意就会翻船。在船上,渡河的红军相互并不说话,也不能点灯,河面上一片漆黑寂静。茫茫夜色中,20条渔船来回穿梭。当红军队伍全部被安全送过河后,天色已微微发亮。

1934年10月19日晚,另一批红军官兵要从罗坳镇石尾渡口过河。李声仁和家人往返一趟又一趟,把红军送到河对岸。第二天黎明,红军官兵全部被运送完毕,渔民们累得躺在船头,大口喘着粗气。这时,有位首长模样的红军干部召集他们开会,给每条小渔船奖励1块银圆、5斤大米,每条大渔船奖励2块银圆、5斤大米。那位首长还说:“非常感谢渔民兄弟帮助我们的队伍渡河。等以后我们打仗胜利回来,再来报答大家!”

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反动派占领于都,于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李声仁整个家族划船远走他乡,沿着贡江,转入赣江,颠沛流离,受尽屈辱和困苦。

全国解放后,党和政府把这些在异乡漂泊近20年的“水上人家”找了回来,专门成立了渔业合作社,安置他们的生活。20世纪70年代初,党和政府给他们分土地、建房屋,使这些世世代代以捕鱼为生的渔民走上了岸,再也不用在江河上漂泊。李明荣动情地对我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我们渔民今天红红火火的好日子。”

“晚霞映红于都河,渡口有一支难忘的歌……胜利不忘哪里来,红色源头记心窝……”傍晚,我漫步于都河畔,耳边回响着《红军渡 长征源》的旋律。眺望于都河两岸的繁华景象,我不禁心潮澎湃:国家繁荣富强,百姓安居乐业,不正是当年红军的期望吗?从苦难走向辉煌,筚路蓝缕的峥嵘岁月已化作壮美的英雄史诗,被滔滔河水深情传唱。



祖国繁荣昌盛
周树龙篆刻

赣南的于都河,
江西的于都河,
中国的于都河,
在当代历史的书页上,
看得见——
流水潺潺,
看得见——
金光闪闪!
九十年前十月的那个夜晚,
于都河畔,
宽阔的河岸,
集结的红军队伍,
送行的父老乡亲,
嗒嗒马蹄声、担子磕碰声、
步枪与衣服摩擦声、匆匆脚步声,
还有浪花朵朵,
火光点点……
书写了被后人
特别尊重的,
必须在史册上深情凝视的
一个伟大的起点!

九十年前的那个秋天,
全国山河黑暗一片。
红红火火的中央苏区,
遭到了敌人的强力摧残,
为了保存革命火种,
为了胜利的明天,
红军需要战略转移,
到敌人深远的后方作战。
子弟兵要离开这块红色的沃土,
百姓千般不舍万般留恋。
于都河六百多米宽,
八个主要渡口——
没有桥啊,
只有八百多条小小的民船。
形势紧迫,
八万六千多名将士过河,
需要搭浮桥啊,
浮桥需要木板,
于都的乡亲们,
拆门板,卸床板,
踊跃支前;
有位姓曾的老汉,
带着儿孙
把他那宝贵的寿板,
也毫不犹豫地
送到了搭浮桥的岸边!

于都的妇女,
为红军送茶送饭。
全于都为远行的红军
打草鞋、捐谷、筹款。
就要离别的红军指战员,
做出征的准备,
做深入的动员,
一万七千多名于都子弟,
参加长征告别了家园。
还有一万多名民夫,
参加运输队、担架队,
跟长征的队伍上了前线。
于都穷苦的村落乡间,
妥善安置六千多名红军伤病员。
那些用毛笔,用白粉,用黑炭
写在土墙上的红军标语,
以最简单、最直接的语言,
宣示了红军的宗旨,
破解了群众的谜团——
为了自由的土地,
为了穷苦人彻底把身翻,
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尊严,
必须远征啊,
必须与敌人巧妙地周旋。
有今天这痛苦的别离,
才有明天的胜利和团圆!

九十年前的那个夜晚,
一个巨大的严酷的问号,
摆到了党和红军面前——
先别于都,
去向何方?
没有答案,

于都河,伟大的起点

■胡世宗

只知向前!
啊,前面有茫茫草地,
有皑皑雪山,
有需要突破的乌江,
有马蹄声碎的娄山关,
有悲荡的铁索桥,
更有六盘山上的天高云淡!
有半条被子的故事,
有战马在沼泽地沉陷,
有指战员用七根火柴取暖,
有烈士被掩埋在大雪山……
更有著名的遵义会议,
使党和红军转危为安,
更有甘肃三大主力会师的
锣鼓喧天和红旗招展!

接下有全民族的艰苦抗战,
有百万雄师渡江的船帆,
更有天安门前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壮丽场面。
有上甘岭坑道那钢铁的前沿,
有新中国从废墟上倔强地站立,
有改革开放春风,
吹开遍地的山花烂漫!
九十年前的那个夜晚,
红军从于都河出发,
那清冷的月光啊,
那清冽翻滚的河面,
红军运行坚毅的英姿,
乡亲挥洒泪水的容颜,
都成了历史珍贵的瞬间,
都成了民族永恒的纪念。
九十年前开始的伟大长征,
是我和军队
走向胜利的开端;
于都河那个星光点点的夜晚,
是后来我们不断进军的起点。
中华民族意气风发,
中国道路越走越宽。
豪迈的起点啊,
伟大的起点,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
长征精神永远光芒璀璨!

送别(中国画)

刘辉作



国防纪事

于都县,地处江西省南部,是埃德加·斯诺“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开篇,是索尔兹伯里“前所未闻的故事”的卷首,是巍巍“地球的红飘带”的起点,是伟大长征精神的源头。

碧空如洗,草木葱茏。金秋时节,我行走在一片红土地上,追寻红军足迹,聆听历史回响。

一

何屋,晚清客家居,面积636平方米,有30多个房间,地处于县城闹市区。1934年7月,专门为红军出发长征做准备工作的赣南省苏维埃政府在这里成立。1934年9月中旬,为了给中央红军长征“探路”,受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委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从瑞金云石山来到于都,在何屋的东厢房住了一个月。

我怀着敬仰的心情走进何屋。院落铺满鹅卵石,台阶和地面的夹缝中长满了青苔。院内植物茂盛,翠竹生机勃勃。赣南省苏维埃政府机关办公的场所,有内务部、财政部、粮食部等10余个部门。步入毛泽东简陋的卧室,抚摸着斑驳的桌椅,我仿佛看见他夜以继日抱病工作的情景。

尽管身处逆境,毛泽东仍百折不挠、坚持真理,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国革命的高度自觉。在于都期间,患病的毛泽东坚持检查和指导赣南省苏维埃政府筹粮、筹款、扩红、征调民船挑夫等工作。为指导留守中央苏区的红军开展革命斗争,他撰写了3万多字的《关于游击队动作的指示》。他还经常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并专门前往临近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的于都南部地区调查社情、敌情。1934年9月20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发了一封电报,除了讲当时赣南地区的敌情形势,其中最重要的有这样一句话:“粤都、登贤全境无赤色戒严,敌特容易出入,现已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及肃反。此复。”

红军长征后,于都乡亲非常思念毛泽东,有人甚至甘愿冒险,在何屋的墙壁上,用木炭写下“战场烽火逐千山,铁骑西征几时还”。

二

于都县银坑镇平安村扩红模范钟桂英令人敬仰。

苏区时期,毛泽东两次来到平安村指导革命工作并居住在老街,平安村有276名青壮年参加红军,156人牺牲在长征路上。

睡在我下铺的老兵

■罗浩

军旅点滴

夜晚,我躺在床上,酝酿着睡意。风翻动窗帘的声响,渐渐响起,愈加显出营区之夜的静谧。

我想起一级军士长、老班长杨连京的那一声咳嗽。杨班长退休之前,一直睡在我下铺。很多个夜晚,伴随室内此起彼伏的鼾声,我常在睡意朦胧中听到他轻轻的咳嗽,还有笔尖在纸上摩擦的声响。台灯的白光微微映照桌面,我知道,杨班长又在熬夜写笔记。

来到部队这几年,我习惯了听战友们的鼾声“交响曲”,也习惯了看杨班长深夜伏案的背影。

初识杨班长,是我新兵刚下连时。“以后咱们就是一个班的战友了,大方点,别害羞,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杨班长的普通话并不标准,带着浓重的河北口音。我当时哪里是害羞,只是盯着杨班长领章上的“四道拐”,紧张得说不出话来。

自此以后,我睡在了这位老兵的上铺。不久,我就被杨班长狠狠批评了。在一次修理训练中,我走了神,被杨班长注意到。事后,他问我听懂了没有,我支支吾吾,说不明白。严苛的杨班长第一次对我发火:“如果训练不用心、不专注,部队怎么打仗!你在这儿是干啥的?”我无言以对,埋着头,惭愧不已,决心以后再也不犯这样的错误。

一次高原车辆复训,杨班长带我一

起负责维修保障。当车队驶过一处峡谷,原本已经放晴的天空,弥漫起白雾。突然,视野中出现一道醒目的橙色。仔细看去,那是一个三角锥,前方低洼处,一辆运输车陷在那里。“快,把工具箱拿来,再拿两把铁锹,我们过去!”杨班长边说边推开车门,我紧随其后。

轮胎陷在泥地里,杨班长决定让我试着维修。我将车头机盖打开,利用低压油泵将空气排挤之后,坐上驾驶室,发动打火。“车子动了!”正当我兴奋以为问题解决时,运输车却像一个溺水的人,只是扑腾了几下,依然陷在原地。

狂风席卷着白雪和冰雹,敲打着车子,噼啪作响。我不知所措,萌生退意:“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班长,要不等冰雹停了再修吧?”

“若上了战场,敌人会等冰雹下完再进攻?”杨班长开始检查发动机,随即从后面车厢里找到滤清器扳手。突然,他脚下打滑,摔了一跤,我急忙去扶。“赶紧的,别磨叽。”说话间,杨班长已经爬了起来,衣服上满是泥浆。

我在旁边配合杨班长检修。“快把油水分离器和机油管头检查一下。”我接过扳手,开始拆卸。可冻僵的双手不听使唤,扳手上又结了霜,我试了几次都打滑。“加油,你可以的!”杨班长的鼓励声在耳边响起。他正弓着身子,替我遮挡冰雹。

我拆开分离器,经检查,并未发现问题。我不停地思考着,“知道了!是柴油滤清器出了故障。”我把滤清器拆开,果然发现了堵塞,把吸附在内的杂质排除、

清理,随后安装好。“成功了!”我如释重负。杨班长微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

与杨班长相处久了,我时常见他捧着一个粉色水杯,这似乎与他的年龄和形象格格不入。杨班长看出我的疑惑,解释道:“你看,这是我上高原时闺女塞我包里的,暖心吧?”杨班长眼角眉梢透着笑意,继续说:“她明年就要高考,我也能回去陪她了。”那一刻,我微微愣神儿,在心里算了算,我与他的相处时间,比他和女儿18年里相处的时间都长。

“好男儿,在家被妻儿需要,在部队就要做一个被组织需要的人。”这是杨班长常对我说的话。从睡在他的上铺开始,从新兵到军士,我的一言一行都被这位老兵所牵动着。不知从何时起,面对棘手的事情,我会在心中问自己:“杨班长在的话,他会怎么做?”于是在不断的摸索中,我有了自己的方向。

如今,杨班长已经退休近两年,我时常挂念他,想和他聊聊天。一个休息日,我拨通他的电话,耳边响起熟悉的声音:“又有什么难题把你难住了?”得知我并无要紧事,他便急着要挂断电话:“我还要去帮忙,前段时间村里的路让水淹了。你要加油……”

那一刻,我想起了杨班长的微信名“使命在肩”。

杨班长的退休生活依旧充实而忙碌,他的女儿也如愿考取军校,这些他都没有在微信朋友圈“广而告之”。可我知道,杨班长习惯了奋斗,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践行着部队的一句口号:“在位一分钟,发光六十秒。”